

重新反思五四以降的 中國啟蒙

高全喜

關於五四以來中國啟蒙的反思，筆者曾經在2005年於北京大學參加杜維明主持的「啟蒙的反思」討論會中論及過，基本觀點到目前仍然沒有太大的改變。筆者認為，在今天的中國語境中，對啟蒙運動的全面批判是不妥當的。儘管啟蒙運動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甚至為當今一些思想家嚴厲指責的所謂「現代性危機」，在某種意義上說，也肇始於啟蒙思想，但是對於啟蒙運動的全面否定，即便是在西方當今的語境中，也仍然是片面的。尤其是將這個問題植入中國，就更是文不對題。因此，對於杜維明等人所倡導的基於歐美語境下對中國五四以來啟蒙運動的全面否定，並由此為新儒學另開新章的觀點，筆者是不贊同的。當然，筆者在當時的發言中也指出，不贊同杜維明等人的觀點，並不意味着完全認同西方的啟蒙運動以及中國五四以來所形成的以自由主義為主導的啟蒙話語這個新傳統。

對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具體而深入地分析。所謂「具體」，指的是對於「啟蒙思想」應該有更加全面的考量。在西方十七、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初，實際上存在着三種性質迥異的啟蒙運動。一個是法國啟蒙運動，一個是蘇格蘭啟蒙運動，還有一個是德國的啟蒙運動。這三個啟蒙運動又培育出了兩條路線相反的現代理論乃至制度實踐，一是西方主流的資本主義制度，二是馬克思以降的社會主義實踐。所以，反思啟蒙、批判啟蒙，所針對的究竟是甚麼？如果沒有對啟蒙的具體內容及其所產生的兩個成果加以釐清的話，就難免陷入誤區。所謂「深入」，則是針對中國的啟蒙話語來說的。究竟中國的啟蒙運動到今天是否已經窮途末路？中國是否將進入一個後啟蒙的時代？在這一點上，筆者與那些倡導或批判現代性的學者，是有不同認識的。

在本文中，筆者想就這個問題展開論述，即從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視角來看中國五四運動的啟蒙意義。

儘管五四以來中國的啟蒙運動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甚至為當今一些思想家嚴厲指責的所謂「現代性危機」，在某種意義上說，也肇始於啟蒙思想，但是對啟蒙運動的全面否定是片面的。

一 五四以來啟蒙運動的底色和基本氣質

中國五四以來啟蒙運動的底色和基本氣質，是法國啟蒙運動的繼續，並且經由法國啟蒙運動與德國啟蒙運動的思想結合，加上中國的現實遭遇，竟然奇特地走向了一條通向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的道路。因此，蘇格蘭啟蒙運動及其所呈現出的理論成果與制度實踐，在中國五四運動以降的啟蒙話語裏，幾乎是一個空白。對此，我們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回顧西方啟蒙運動的三個形態，可以說，它們的風格乃至特性差異巨大。法國啟蒙運動基本上是個人權利論的激進主義，它對教會與王權的批判所凸顯的乃是個人至上的理性主義和個人主義。德國啟蒙運動則是與德意志民族的復興相聯繫的，所以，這個啟蒙運動很快就與德國的國家主義相結合，變成了一種強勢的德意志民族精神。相比之下，蘇格蘭啟蒙運動則是較為適中和溫和的，它以文明演進論為底色，尋求的是個人自由與政治社會的平衡，是在改良主義主導下的文明演進論，其中既強調歷史和傳統，同時又彰顯個人價值和法治秩序。蘇格蘭啟蒙運動最富有建設性的成果就在於，它對英美的社會構建、現代資本主義的塑造，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中國五四以來的啟蒙運動，嚴重忽視了蘇格蘭啟蒙運動這一派的理論成果。五四激進的反傳統和個人主義，在短暫的高揚和激烈之後，隨着中國社會面臨的民族救亡危機，很快與德國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結合在一起。後來，隨着社會主義在歐美乃至東方的盛行，五四啟蒙運動的傳統又逐漸與社會主義合流，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的一個理論淵源。當然，這個啟蒙思想的主體思潮在中國的處境也是坎坷曲折的，又有過幾個變身。通過這幾個變身，原先那種法國式的個人主義和權利主義被清除掉了，激進的反傳統和群體主義保留下來，後又與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理論結合在一起，變成了毛澤東時代的一個理論符號。改革開放之後，這種啟蒙運動又開始了另外一種變身，即與經濟改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尤其是經濟個人主義，以及全球化和西方化結合在一起。這個變身還沒有完成，就又與權貴資本主義有所結合，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的一種話語形態。所以，啟蒙運動經過這兩個變身，就完全改變了原先五四啟蒙運動的面目。

從五四運動的啟蒙話語，到文化大革命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到改革開放的經濟社會、乃至政治上的權利主義，直到開始淪落為權貴資本主義的護身符，啟蒙運動在中國已經面目全非，聲譽不佳，致使對其反思乃至批判的聲音甚囂塵上。對這種批判性的理論傾向，我們應該給予理性的、同情的理解。確實，五四以降三個面相的啟蒙話語在中國已經是難以為繼了，墮落了，應該對此加以反思乃至批判，在這一點上，筆者是贊同反思啟蒙運動的。因為這三個面相的啟蒙運動都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啟蒙話語，在筆者看來已經遠遠脫離了啟蒙的本意。對它們進行深刻反省，無疑是有道理的。

從五四運動的啟蒙話語，到文化大革命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到改革開放的經濟社會、乃至政治上的權利主義，直到開始淪落為權貴資本主義的護身符，啟蒙運動在中國已經面目全非。

二 反思啟蒙運動的三個理論背景

但是，反思上述三個層面上的啟蒙話語，是否就意味着我們跨越了啟蒙運動的時代，而進入一個後啟蒙的時代？對於這一點，筆者要大大地加以質疑。現在對於啟蒙運動的反思，在中國的語境下，有如下三個理論背景。

其一是傳統的保守主義對於啟蒙運動的反彈，這以港台的新儒家和中國大陸的政治儒學家為代表。他們厭惡五四以來對於傳統持激進否定的態度，要斬斷這個導致傳統文化乃至傳統政治覆滅的魔手。他們對啟蒙的反思乃至批判，是為了弘揚所謂的「傳統文化」，是為了新儒學的復興和政治儒學的粉墨登場。

其二是反自由主義的、傳統社會主義的理論訴求。在這一派看來，中國的啟蒙運動，無論是五四的啟蒙，抑或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啟蒙話語，都是來自西方資本主義的。因此，對於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的話語形態，對於這種與他們心目中的自由主義勾連在一起的啟蒙運動，必然要加以反對。他們反對的是啟蒙運動中的自由民主、個人權利、經驗理性主義的特性，他們要回復到傳統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平等主義那裏去。殊不知這樣一種基於社會主義的反對，本身其實正是啟蒙運動的產物，本身就是啟蒙思想的一種形態。他們沒有看到，毛時代的話語中實際上就有啟蒙的底色，這就涉及到前述啟蒙運動的三個形態。對於民主、平等、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式強調，就是西方啟蒙運動中的一個重大成果。所以，站在啟蒙的一個譜系，去反對啟蒙的另外一個譜系，這種反對有時候看上去是強有力的，實際上卻是非常空虛、軟弱無力的。與其說他們反對啟蒙，不如說是反對啟蒙中的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

其三是後現代的學院派話語。這樣一套對於啟蒙的反思和批判，借鑒的理論是西方學界當今走紅的那一套後殖民、後現代、後主權國家的諸多理論，其論述者們反對啟蒙是與反對現代性結合在一起的。他們認為啟蒙運動所開啟的現代資本主義到今天已經窮途末路了，導致了所謂「現代性危機」，導致了全球化的災難，因此他們要對這樣一個歷史故事大加討伐。他們要建立一個美麗新世界，即後現代社會。這些理論的重大問題在於忽略了後現代也是現代的產物，而且後現代所依靠的制度平台，依然是現代政治，尤其是啟蒙運動所奠定的現代政治。如果把這個基礎抽空，他們又何所憑藉？這種後現代對啟蒙的批判話語大多是空想性、觀念性，以及充滿烏托邦性質的。當然，這樣一種批判在西方當今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諸如理性主義的弊端、資本主義的災難、環境問題、權利至上問題、法治形式主義問題、代議制民主問題、極端個人主義問題等等，確實需要給予一種追根溯源的反省。

問題在於，上述三個反思、批判啟蒙的理論背景，在中國當今的語境中，對於重新反思五四運動以降的啟蒙運動，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呢？這是下面要談的問題。

三個理論譜系對於五四以降的三種啟蒙面相的反思和批判，本身是否就意味着中國的啟蒙已經完結？這些理論在批判了啟蒙之後，又能夠為中國社會貢獻甚麼呢？它們批判有餘，建構不足。

三 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啟迪

在此先要問的是，我們反思的是何種啟蒙？我們需要何種啟蒙？筆者的看法是，上述三個路徑的反思都有一定的建設性意義。五四運動以降三個啟蒙話語的變身，導致了上述三個路徑的批判，是有道理的。五四運動反傳統的革命性破壞，是需要保守主義加以矯正的。而對於個人權利和利益至上論，尤其是權貴資本主義，是需要社會主義的公平理念和社群主義、集體主義予以矯正的。至於現代社會技術理性的泛濫與狂妄、國家主權的膨脹和全球化對於欠發達國家的掠奪，也需要後現代的聲音來加以斥責。

蘇格蘭啟蒙運動沒有革命訴求；即使有，其「革命」也是包裹在改良主義那裏的。社會改良的演進論和「光榮革命」的結合，使得英國的市民社會呈現出一個雖然經歷了古今之變，但又沒有付出災難性代價的雙贏結果，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效法。

這些都有道理，但是問題在於，上述三個理論譜系對於五四以降的三種啟蒙面相的反思和批判，本身是否就意味着中國的啟蒙已經完結？在這個問題上，筆者的看法與上述三個理論不同。它們的觀點雖然在批判啟蒙的着重點上有所差異，但在下面一點上的取態它們是一致的——五四以降的啟蒙任務已經完成，或者是已告失敗，應該退出歷史舞台。然而問題在於，它們批判了啟蒙之後，又能為中國社會貢獻甚麼呢？它們批判有餘，建構不足。儒家的保守主義建構的是甚麼？是儒家的心性哲學和王朝政治？這些東西與當今中國社會的實質訴求關聯甚少。社會主義的批判所建構出來的，是貧窮的社會主義還是無法無天的制度？顯然，在今天，它們已經不合時宜，也沒有人會接受。至於後現代的批判，就更是毫無建構可言了。後現代能給中國貢獻出一個制度形態和價值基礎嗎？這些在西方都尚未培育出來，在中國更是痴人說夢。

所以，筆者的觀點是，我們要好好研究啟蒙運動。可以說，五四以降的啟蒙運動，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失敗的啟蒙，我們由此需要改弦易轍，重新啟蒙，去探討是否還有另一種既能夠避免原先啟蒙的諸多弊端，而又在制度和價值層面具有建構性的啟蒙。在筆者看來，這個啟蒙就是蘇格蘭啟蒙的路徑。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在中國複製蘇格蘭啟蒙運動，而是學習和研究其原理。在筆者看來，這些原理不外乎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同情地理解傳統，尋求傳統的自我轉型。在這一點上，蘇格蘭啟蒙運動給我們做出了良好的榜樣。蘇格蘭啟蒙思想家通過文明演進論，通過一種自發的、經驗理性的演進秩序，很好地解決了傳統與現代關係的問題，解決了傳統美德與現代個人主義的張力性對峙。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通過進一步研究弗格森 (Adam Ferguson) 的文明演進論，從文明的角度把這個傳統與現代的合作關係、傳承關係處理得更加妥當，這一點是與法國大革命反傳統的氣質、五四運動的反傳統、毛時代的反傳統迥然不同的。在蘇格蘭啟蒙運動那裏，是完全可以通過對傳統的傳承來進行啟蒙的。啟蒙與傳統並不絕對對立，這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給我們提供的有益教誨。

第二，處理革命與改良的關係。啟蒙運動並不絕對地訴求革命，尤其是阿倫特 (Hannah Arendt) 意義上的全面的社會革命。社會革命與「光榮革命」這種類型的政體革命是大不相同的。法國和德國的啟蒙運動以及所派生的社會主義這

一脈，訴求的是全面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即企圖徹底打破一個舊世界和舊政治，建立一個新世界和新政治。這種啟蒙革命的思想，所導致的只能是災難。中國五四以降的三個啟蒙運動以及對此的三個路徑的批判，都還是陷入了通過激進的社會革命和絕對的政治革命來完成其訴求的窠臼，這是非常恐怖的，而且肯定是悲劇性和災難性的。但是，蘇格蘭啟蒙運動沒有革命訴求；即使有，其「革命」也是包裹在改良主義那裏的。改良主義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緩慢演進來完成社會變革；一是通過「光榮革命」這樣一種狹義的政體革命來完成政治變革。所以，社會改良的演進論和「光榮革命」的結合，使得英國的市民社會呈現出一個雖然經歷了古今之變，但又沒有付出災難性代價的雙贏結果。這樣一種啟蒙的智慧，是我們需要認真學習和效法的。

第三，處理個人自由與公共利益的問題。我們看到，激進版的啟蒙運動，無論是法國和德國的啟蒙運動，還是中國的啟蒙運動，總是在個人與集體、個人自由和公共利益（國家、民族或主權利益）的極端化二元對立中搖擺。或者是原子式個人的至上，或者是國家主義的至上、公共利益的至上，而雙方又處在無休無止的鬥爭之中，一會兒是個人主義的全面的、極端化的高揚，一會兒又是國家主義的絕對化宰制。這樣你死我活，反反覆覆，所謂「瞎折騰」。社會處在動蕩之中，人民處在貧困之中，自由、正義從來沒有實現過，國家也從來沒有強大過。這些歷史上一幕幕的慘劇，罄竹難書。

蘇格蘭啟蒙運動卻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有效解決以上敵對狀況的法寶，那就是法治與憲政，通過規則來協調個人與他人、社會與國家的關係。一方面，通過憲法政治來維繫個人自由，限制國家權力的肆意妄為；另一方面，通過私法自治來促進和保障個人的發展空間，在公法和私法兩個層面上豎立起法治主義的閘門，平衡個人與國家的關係，確保個人的自由空間和國家公共利益的空間。所以，休謨(David Hume)的法治三原則，斯密(Adam Smith)的市場經濟與有限政府理論及其基於同情心的道德哲學，這些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重大成果，值得我們給予高度重視和認真對待。

四 結語

蘇格蘭這樣一類啟蒙形態，在中國五四以降的三個啟蒙面相以及反對啟蒙的三個理論路徑中都非常欠缺。我們用這樣一種啟蒙來為啟蒙正名，來重建我們的啟蒙話語，不是更好嗎？所以，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反思舊的啟蒙，重啟新的啟蒙。五四運動以降的啟蒙是一種錯誤的啟蒙，或至少是偏頗的啟蒙，現在我們要改弦易轍，這不是不要啟蒙，而是尋找一條正確的啟蒙路線。這種正確的啟蒙話語與制度的實踐，在中國還遠未完成。以這種啟蒙來建設我們的社會、國家和個人，要比擯棄啟蒙更符合當今中國的時代精神。

五四運動以降的啟蒙是一種錯誤的啟蒙，或至少是偏頗的啟蒙，現在我們要改弦易轍，尋找一條正確的啟蒙路線，以這種啟蒙來建設社會、國家和個人，這比擯棄啟蒙更符合當今中國的時代精神。